当代中国对外关系  
**Contemporary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授课教师**肖佳灵 副教授（[jlxiao@fudan.edu.cn](mailto:jlxiao@fudan.edu.cn)）

**助教**施欣怡（[23110170016@m.fudan.edu.cn](mailto:23110170016@m.fudan.edu.cn)）

李昱蓉 （[23210170014@m.fudan.edu.cn](mailto:23210170014@m.fudan.edu.cn)）

张馨月（[zhangxinyue@fudan.edu.cn](mailto:zhangxinyue@fudan.edu.cn)）

**目录**

[第一讲 绪论：当代中国外交的海外研究学术背景 3](#_Toc192515159)

[一、美国学派（U.S. School） 3](#_Toc192515160)

[（一）1949年至1960年代下半叶的美国学派 3](#_Toc192515161)

[（二）1960年代下半叶至1970年代的美国学派 4](#_Toc192515162)

[（三）1980年代的美国学派 4](#_Toc192515163)

[（四）1990年代之后的美国学派 4](#_Toc192515164)

[二、欧洲学派（European School） 5](#_Toc192515165)

[第二讲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概述 5](#_Toc192515166)

[一、关于外交、外交思想的定义 5](#_Toc192515167)

[（一）外交 6](#_Toc192515168)

[（二）外交思想 6](#_Toc192515169)

[二、中国外交思想史的时期划分 6](#_Toc192515170)

[（一）古代外交思想 6](#_Toc192515171)

[（二）近代外交思想 6](#_Toc192515172)

[（三）当代外交思想 7](#_Toc192515173)

[三、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7](#_Toc19251517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世界观和外交观——理论源泉与理想主义 7](#_Toc192515175)

[（二）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和理论——批判吸收与现实主义 9](#_Toc192515176)

[（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潜移默化与实用主义 10](#_Toc192515177)

[（四）“理论合力” 13](#_Toc192515178)

[四、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13](#_Toc192515179)

[（一）历史教训 13](#_Toc192515180)

[（二）国内环境 14](#_Toc192515181)

[（三）国际格局 15](#_Toc192515182)

[五、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16](#_Toc192515183)

[（一）独立自主 16](#_Toc192515184)

[（二）和平发展 17](#_Toc192515185)

[（三）和平共处 17](#_Toc192515186)

[（四）对外开放 18](#_Toc192515187)

[（五）以民为本 18](#_Toc192515188)

[第三讲 当代中国外交体制概述 19](#_Toc192515189)

[一、导论 19](#_Toc192515190)

[（一）1949年以前中国外交体制的历史演变 19](#_Toc192515191)

[（二）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外事机构 20](#_Toc192515192)

[（三）两个重要理论问题 21](#_Toc192515193)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体制 21](#_Toc192515194)

[（一）主要决策机制 21](#_Toc192515195)

[（二）主要外交执行机构及其职能 24](#_Toc192515196)

[（三）重要外事辅助机构 24](#_Toc192515197)

第一讲 绪论：当代中国外交的海外研究学术背景

2025.2.17

海外的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目前主要有美国学派、欧洲学派与日本学派。

一、美国学派（U.S. School）

美国学派自1949年起步，发展到当代，已经成为了最主要与盛行的研究流派。不同时期，美国的研究路径（主流学派）也有所不同，如下表：

|  |  |  |  |
| --- | --- | --- | --- |
| **时间** | **研究路径** | **代表学者** | **关注点** |
| 1949年~1960年代下半叶 | 传统/历史学派 | Fairbank | 传统的延续 |
| 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 Benjamin I. Schwartz | 个人的独特作用 |
| 现实主义学派/理性行为理论 | Allen S. Whiting | 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权力因素 |
| 1960年代下半叶~1970年代 | 中-苏-美“战略三角” | Henry Kissinger | 政治/策略互动 |
| 派系政治论 | Andrew Nathan  Robert Ross | 精英政治 |
| 1980年代 | 制度主义 | Doak Barnett  Lieberthal Okesenberg | 结构、过程、多层次 |
| 认知主义 | Gilbert Rozman  Allen S. Whiting  David Shambaugh | 认知、想象 |
| 行为主义 | / | 实证、普遍性 |

（一）1949年至1960年代下半叶的美国学派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跨过了鸭绿江。刚建立不久的中国为何要出兵？针对这个问题，当时美国的不同流派给出了不同答案：**历史学派**基于其过往经验，认为对中国外交的最基本的解释变量是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延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外交不会脱离“帝国情节”。

研究一个大国（如中国）却不考虑它的历史，尤其是其外交政策中的传统，无异于闭着眼睛飞行。

——费正清

秉持**意识形态路径**的学者则迁移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模式进行解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外交的运行准则。他们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如“人民战争”“统一战线”等，这也是中国与苏联的不同之处。此外，毛泽东的个人角色与思想（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也被考虑在内。总之，意识形态路径认为要“以中国的方式理解中国”。

**现实主义学派**将当时在西方盛行的现实主义概念（如国家力量、国家利益、国际约束等）用于对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研究之中，尤其是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危机管理之中。这一学派认为，新中国的某些对外行为是出于对外部威胁的感知从而作出的理性决策。

（二）1960年代下半叶至1970年代的美国学派

到60年代末期，在中苏交恶、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上述三种研究路径接连碰壁，于是就诞生了新的流派。

**“战略三角”流派**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与其他大国交往时的行为，强调中国与苏联、美国的三角博弈；这一流派对于中国国内政治采用了极权主义模型，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则采用了单一行为者理论。

**派系政治论**则基于当时中国领导层在外交上的可能分歧（如林彪叛逃、中美关系正常化），提出了中国高层的内部派系斗争是解释中国外交的主要因素。这一流派以“中南海综合征（Zhongnanhai Syndrome）”概括1970年代以来中国的精英政治。

（三）1980年代的美国学派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推进，更多外国学者能够来到中国大陆，之前各流派对中国外事的猜想甚至是臆测也都失去解释力了，新的流派随之崛起。

随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以及中国决策体系的公开化，**制度主义**被提出，其关注中国对外政策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决策者的思维模式。制度主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决策制度与决策者。自1980年代早期以来，关于中国古今军事制度与战略的研究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计算机的发展使量化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变得更普遍，认知主义与行为主义随之而来。**认知主义**聚焦于与当代中国对外政策息息相关的想象和认知，从制度和个人两个角度系统分析了中式思维的深层结构及其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影响。认知主义连接了制度主义与其下的认知流派，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正式到非正式的跨越。

自1978年起，美国学派逐渐意识到无法获悉中国对外行为的全貌，**行为主义**也正是因此兴起。行为主义强调政治的结构与形式发展、政治人物崛起的环境因素。基于对实证问题的清楚定义以及对各类假说的测试，行为主义将科学的模型与方法论应用于政治学之上；行为主义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数据综合分析等方法，进行案例研究与定量研究，从而找出输入（如各类社会经济心理因素）与输出（如国家的对外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主义对当代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个假设：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已发展成为一个多领域的综合性体系。

在其发展过程中，行为主义分化出了两个极端：实证主义的极端认为，只有将其解构为可观测且可测量的单元，中国的外交才能被正确理解；普遍主义的极端则认为，必须建构起一个普遍性的、包罗万象的有关中国外交行为的理论体系。

自1970年开始的行为主义革命机械地将“科学”方法应用在社会科学上——政治与社会与自然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但其中不规则的、偶然的、存在偏差的现象却在此时被忽视了。

（四）1990年代之后的美国学派

从9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又逐步回到了文化领域。此外，**新制度主义**批判继承了制度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于中国要从历史、制度、文化、认知等多方面综合起来，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新制度主义秉持中庸之道，兼顾理论严谨性与实证相关性，侧重于更具政治相关性的问题，如决策机构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系统因素；新制度主义考虑国际和国内因素将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并受其影响，也考虑决策者和专家不断变化的观念；新制度主义将历史、分析、理论和预测均衡地结合起来，呼吁“国家的回归”。

来到21世纪，中国的外交成为了一门“显学”，美国对中国外交的研究也形成了两个学术共同体：一个是基于大学的学者群体，他们多以历史学或政治学为背景，注重中国的历史发展，以比较的方式研究中国外交；另一个则是基于智库及基金会的群体，如哈德逊研究所、胡佛研究所、新美国安全中心等，其中多为曾在联邦政府任职的官员，虽然有较多的现实政治经验，但缺乏学术背景，较为短视，提出的理论也时常迎合当届美国政府。

总而言之，美国学派从方法、维度、议程、议题、知识体系（术语、理论）、价值引导等方面都已经成为了当下的主导流派；从美国学派中培养出的“中国问题专家”遍布世界各国高层，形成了看待中国外交的“共同话语”。

二、欧洲学派（European School）

欧洲是最早对中国外交开展研究的。欧洲对中国的早期研究集中于历史、文化、科技等方面。1948年至1950年代，汉学研究在欧洲逐渐复兴，由关注新中国国内发展的汉学家与记者主导。当时的欧洲学派基于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对外政策，加上部分的苏联影响，强调了“中国例外主义”。

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是欧洲学派的又一个时期。当时，抗美援越、文化大革命、中苏交恶三大事件，以及美国反越战、法国五月风暴两大学生运动，都促使欧洲对中国产生新的看法。当时，欧洲学派的主要流派有阶级斗争视角与功能/观念集团视角；相比于美国学派关注中国制度的威权主义，以及外交上视中国为敌对者，当时的欧洲中国研究则对中国发展的轨迹持较为同情的看法。

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在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出现了国别研究学科，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中国研究的国别和地区协会组织，如欧洲中国研究会、英国中国研究协会、北欧中国研究协会等。此外，中国研究还获得了更多的资金；企业也开始给商学院出资研究中国，为日后在中国的投资做铺垫。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更关心“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治理危机”等，但欧洲的关注点与美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欧洲学者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会持续下去，因此，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运作而不是预测它何时崩溃。欧洲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逻辑，而不是担心一个崛起的修正主义大国改变世界均势。

第二讲 当代中国外交思想概述

2025.2.24 / 2025.3.3

一、关于外交、外交思想的定义

（一）外交

在学术上，“外交”总体上可以分为“大外交”和“小外交”。

“大外交”指的是外交的宏观层次，其与“内政”相对应，这是就政治学角度而言的；外交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同外界打交道时的一种政治，是一国政府针对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趋势所做出的回应。“大外交”也涵盖了外交的中观层次，其与“战争”相对应，这是就国际法角度而言的；外交指的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国家间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行为。

“小外交”则指的是外交的微观层次，即外交专业，这是就外交学角度而言的；外交是各国外交部所属专职人员和机构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

（二）外交思想

外交思想（doctrine）是决定和指导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外交原则和对外政策的思想，一般由一国领导外交的最高官员进行表述，反映在国家有关外交的文献中，也反映在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实践和国家有关人员的外交活动中。

二、中国外交思想史的时期划分

各国的外交思想有不同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体制/制度基础，这三大基础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一）古代外交思想

从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到前清，是我国的古代外交思想时期。简而言之，当时外交思想的基本架构是“家-国-天下”、内圣外王的观念。“天下”观使得中国并非追求建立单一民族、单一宗教的帝国，而是具有相当的包容性——这与同时期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异端”理念也是不同的。

中国古代外交思想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古代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开放包容，推崇实行德治教化、以德报怨、内圣外王等治边安邦的政治理念，主张“修齐治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此建立了独特的薄来厚往的“朝贡（外交）”体系；另一方面，古代外交思想保守迂腐、封闭狭隘，轻视所谓“化外之地”。

1405年至1431年，明朝初期，郑和七下西洋；1566年，英国的德里克开始航海，此时正值明朝中期；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4年，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在1648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的这近二百年，西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并确立了民族国家体系。

（二）近代外交思想

在西方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同时，中国却依然闭关锁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的序幕。

1840年至1949年，是我国外交思想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期，也是自汉之后，中国外交思想交锋最复杂、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中交织着晚清王朝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晚清政府与民国先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不同的外交思想和主张的斗争。

这一时期是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外交思想内容最丰富的时期。一批又一批时代的精英试图打破传统外交思想的束缚，一面反省和清算中国传统外交的弊端，一面提出以全新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思想，试图为中国开创一个适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外交新天地。当时，出现了魏源、冯桂芬、严复、邓演达等开明的思想家，林则徐、曾国藩、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张之洞等识时务的晚清官员，孙中山等有抱负的政治活动家，陆征祥、顾维钧、王宠惠、颜惠庆、胡适等才华横溢的职业外交官。但是，在国家性质与综合实力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弱国无外交”，他们个人的努力都没有改变中国在外交场上的处境。

（三）当代外交思想

1949年至今，是我国的当代外交思想时期。从1921年至1949年，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最早萌芽时期，中共早期的政治文献、论著、期刊等提出了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主张、原则、政策，中共早期的对外交往实践也发生于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当代外交思想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起点（或转折点）。1949年至1978年，是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外交思想；1978年至2012年，总体上可概括为邓小平时期的外交思想；2012年以来，是习近平新时代的外交思想。

三、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世界观和外交观——理论源泉与理想主义

1. 马克思列宁主义外交思想的内容

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社会给中国的定位中非常强调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事实上，在战后的国际关系中，由于冷战的原因，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或外交实践完全排斥意识形态因素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已经认识到，在国际关系领域，阶级斗争的规律明显地不同于国内斗争。因此，在一些经典著作中有大量篇幅对国际关系和外交进行详细论述，并使用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等概念。最有代表性的与国际关系相关的马列经典著作有：

* 《共产党宣言》（马恩合著1848)
* 《18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1856）
* 《资本论》（马恩合著1867、1885、1894、1910）
*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1871）
*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恩格斯1890）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1916）
* ……

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述和书信中提到了中国，他们于1853~1862年间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18篇，谴责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揭露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其中一些重要的思想后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国和指导党和国家外交实践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方法论上树立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提供了研究国际政治的范例（如1870~1871年马恩对普法战争的研究）；在观念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关于战争的科学看法、关于国家平等民族平等的观念、关于和平外交的观念、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念、关于阶级外交的观念等。

2. 马克思列宁主义外交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提摩太是最初将马克思、恩格斯、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带到中国来的人。陈望道首次将《共产党宣言》翻译至中文。自此，共产主义理想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在日后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20世纪，中国面对了三个西方。20世纪初期，中国一批有志之士前往了自由主义的欧洲，学习“德先生”“赛先生”，但1918年的巴黎和会让中国对欧洲彻底失望。后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转向了共产主义的苏联，而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等思想有所共通，因此能较好地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是，20世纪中期中苏交恶，乃至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面对的第二个西方也不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众开始对现实主义的美国产生好感，但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也打消了中国人对美国的幻想。因此，21世纪，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外交思想道路。

3.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影响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新中国外交实践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包括：

* 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 1925年12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1937年7~8月《矛盾论》《实践论》；
  + 指导革命与抗战胜利，如《论持久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
* 建立新中国：国体、政体的选择；
* 国际格局、形势判断，相应的政策调整；
* 和平发展主题；韬光养晦；人类命运共同体；
* 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支持亚非拉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维护；
* 民族独立、抗击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
* 主动承担国际义务，长期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私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援助。

消极的一面包括：

* 曾教条地强调以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来划分国家间敌友界限；
* 曾过分强调国际主义高于国家利益；
* 推迟中法建交；
* 与前南斯拉夫关系问题；
* “文革”中把“世界革命”当成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当成中国对外关系的行动纲领；
* 超越能力的对外援助；
* 拒绝西方援助等。

4.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外交思想的评价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19世纪中叶后出现的一种政治学说，具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双重功能：方法论上的社会设计功能，即实践理性，行动指南；理论上的社会启蒙功能，即认识理性，“规律-趋势”理论模式，把握本质。与现代经济学工具理性的实用性相比，马恩的经济学更具思想的认识和启蒙功能。

在剖析国际形势和指导外交战略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相当科学性。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五大洲曾经有众多的信奉者；战后，冷战意识形态对立，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被西方不断“妖魔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本论》重新成为畅销书——证明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经典的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一种学说、一种思想、一种理想，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向前发展，才能具有生命力，要让其思想性和工具性有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演进的某些论断的确已经过时，但马列主义观察国际问题的一些辩证思想至今在指导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和外交实践时仍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列主义国家观、世界观和外交观中的一些原理，对新中国外交的指导作用，迄今仍可以说是成功大于失误。

（二）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和理论——批判吸收与现实主义

1. 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和理论的内容

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包括主权、均势、国际法等；其核心有国家利益、实力外交、地缘政治（海权、陆权、空权等）、文明冲突等。二战前，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是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各种理论，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二战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逐渐出现。现代国际关系还包括了国际法原则，如《联合国宪章》。

中国传统外交和东方社会的朝贡体系（如皇权、敕谕、城下之盟、攻守同盟）并没有西方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主权、均势和国际法概念。中国签订的第一个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条约是1689年《尼布楚条约》。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对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条约、实力等原则逐步有了深刻的理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仅使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也使主权、平等、民族主义等概念，深刻地嵌入20世纪中国政治革命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有排斥“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国际关系体系”中呈现的一些进步的外交原则和外交理念，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对它们进行“中国化”的吸收。

2. 主权

对于“主权”，西欧的经验是“一族一国一主权”；孙中山的思路是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变为“五族共和”；“中国化”的经验则是“多民族一国一主权”。

中国与西欧的经验不同，在于两者有完全不同的国际政治和族际政治历经和经验。中国有着悠久的大一统传统，强调文明凝聚力与包容性，具有较强的地缘向心力；新中国建立后，用“民族自治区”和“一国两制”等原则来确立和稳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主权。总之，中国是以自然形成的国家（country）为基础进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设。

3. 国家利益

建国初期，由于受“阶级外交”、“国际主义至上”等意识形态的束缚，为避免“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嫌疑”，更多地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外交工作中的重要性。“文革”结束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外交原则和外交政策进行了逐步调整。

胡耀邦于1982年在中共12大报告中首次公开宣布，“民族利益”（即“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邓小平

我们都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工作的。

——江泽民

2011年，胡锦涛明确界定了“国家的核心利益”。习近平则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2011年9月7日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对国家核心利益作出清晰明确界定：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直到1971年重返联合国，中国才真正被“西方中心”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所部分接纳和部分认同。中国一直在努力学习和适应各种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的原则和规则，以融入全球体系。加入WTO后，中国学习和内化现代国际经济贸易原则，如知识产权等观念、规则、法律。 冷战终结后，中国采用了“外交新思维”，认为“国家利益”是外交服务的主要对象。后来，“民本主义”的外交理念日益受到重视和强调。

中国外交思想从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强调“国家利益”到重视“民本主义外交”的思想发展脉络，顺应了现代国家主流的外交理念发展。

美国的模式不适宜推广到法国。墨西哥抄美国宪法，但墨西哥还是墨西哥，拿破仑曾经向西班牙推广法国的宪法，西班牙还是西班牙。

——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

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2015年9月25日与奥巴马会晤时

（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潜移默化与实用主义

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

——费正清

任何国家都不能否定或摆脱其传统的政治文化对现实外交理念、外交风格等的影响：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政治文化对欧美各国外交思想的影响，儒家文化、佛教、神道、印度教等对亚洲各国外交思想的影响，伊斯兰文化对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外交思想的影响，都不容忽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绵延至今，博大精深，其中既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也包含了高超的治国艺术和外交艺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更突出地表现在对腐朽的、落后的“封建”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的反叛和决裂。几代领导人既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或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饱学之士，或曾受过良好的国学启蒙教育，都非常注重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治国智慧中吸取营养。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西学中用”、“古为今用”的“中国式/特色”的革命。

传统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观念是“家-国-天下”，天下是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在性的世界体系；大一统是文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延续共同体的统一。传统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秩序是“同心圆”，包括中国中心论、礼法秩序等。传统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方式是内圣外王。

1. 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以德报怨、薄来厚往，体现出古代中国“王道”为主要特点的外交。“王道”又可分为三种：

* **纯粹王道（pure benevolent rule）：**宋、明；孟子的绝对理想主义+道家的与世无争；君子之道、郑和下西洋——理想派；
* **务实王道（pragmatic benevolent rule）：**汉、唐及前清；荀子的相对理想主义+墨子的兼爱、非攻；武力+怀柔——理想派；
* **霸道（despotic rule）：**秦、隋、元；法家，包括兵家与纵横家；反对空谈仁义道德，崇尚实力、暴力、谋略与权术——现实派。

2. 大国气度、信守承诺

中国有大国气度，信守承诺。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中国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援助、对巴勒斯坦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等，都体现了大国担当与道义。

中国是大国，要对人类发展做出贡献。

——毛泽东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国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尽自己所能在资金、物资、医疗、疫苗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与援助。向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为有需要的34个国家派出38支医疗专家组。发挥最大医疗物资产能国优势，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已向69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疫苗援助。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数千亿件抗疫物资，2200多亿只口罩、23亿件防护服、10亿份检测试剂盒。

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习近平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中国不输出革命、不输出饥饿、不卷入战争、不输出难民。中国对自己负责，促进脱贫、温饱、小康。中国对世界负责，为全球事务、全球治理做贡献，如“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共商共建共享、《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中国立场》、《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等。

中国信守承诺。已经签署的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协定等，中国的履约程度、质量名列前茅，如WB&IMF贷款项目优质完成；还贷、脱贫、环保等指数，都提前完成。

3. 不畏强暴、刚柔并济

中国在原则问题（如事关主权领土完整等问题）上，坚持正义、反对霸权。例如，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反对苏联老子党、60年代反帝反修、70年反对霸权、80年代不结盟；21世纪反对美欧“霸凌”打压等。中苏关系改善三条件、中美建交三条件、中国“复关”三原则、气候谈判责任原则、华为Tik Tok等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也都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外交深谙“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艺术，如1999年南斯拉夫北约炸馆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等。

中国外交坚持以我为主，“柔弱胜刚强”。1955年8月1日至1970年2月20日期间，中美之间进行了136次的大使级会谈；中国重返联合国，用了22年；中国复关WTO谈判，用了15年；中美经贸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经过了11轮谈判。

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坚定而超然。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象传》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王毅，2025年2月14日在第61届慕安会“中国专场”上的讲话，引用自金庸《倚天屠龙记》

4. 以和为贵、求同存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是追求中庸、和谐发展的思想。

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

——《周礼》

这一思想在传统外交中表现为“和为贵（harmony is prized）”的理念。2004年中国首次提出构建和谐社会；2005年中国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2013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平发展合作共赢；2021《全球发展倡议》、2022《全球安全倡议》、2023《全球文明倡议》也都体现了这一点。1999年“中国威胁论”、2012年“修昔底德陷阱”、2017年“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则是西方政治逻辑和政治经验的结论。

中国外交提倡求同存异、实用主义，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如“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台问题；主张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缓和、解决与日本、南海诸邻国在海洋领土的争端等。

5. 合纵连横与不结盟

国际统一战线、1946年“中间地带思想”、1960年代“两个中间地带理论”、19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及在处理中美苏、中美日等多个三边关系时所体现的政治智慧，都体现了中国在“合纵连横”与不结盟上的智慧。

结盟？“准”结盟？不结盟？经过近现代五次中俄、中苏结盟的教训，1982年不结盟政策，1989年被“孤立”危机的教训，以及冷战后1993始北约推行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之后，在这些诸多选择中，中国最终选择了“伙伴关系”。1998年4月《人民日报》，大国间关系可归纳为3种基本模式，即伙伴关系、结盟关系、非结盟非伙伴关系，中国“伙伴关系”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关系。2014年，中国开始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截止2024年2月，与107个国家、地区、组织建立不同类型（9至11种称呼与机制）的伙伴关系。

“结盟”在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经验是“缺失”的。有学者指出，东亚是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非对称和平/秩序，欧洲则是武力竞争基础上的均势。

总之，中国外交的哲学基础自西周起，在春秋、秦汉发展。中国早熟的政治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有经有权、权衡变通、合于大道。这就是“轴心时代”三大哲学根基之一——孔子、老子时代古代中国的实用理性。

（四）“理论合力”

“理论合力”的重要产物之一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为了解决中印、中缅边界的实际问题，其吸取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精华（平等互惠、合作共享），体现了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大小平等，和平共处），包含了中国传统的“王道”思想（大而不霸、小而不惮）。

另一个“理论合力”的重要产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这一概念最早是为了推动全球化进程而提出来的（2013），吸取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的精华（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超越国家、阶级、种族、信仰差异），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和谐天下”思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可见，不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融通了中外古今的外交理念，既是理想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当然，也有实用主义的意味——因此，都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

四、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一）历史教训

独立、主权、平等、和平、开放——这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所失去的，也是在接下来一百多年内所追求的。

1. 实现独立自主的、领土完整的主权的愿望

1840至1949年，前后有18个国家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1175件对外条约、协定、规定、章程（其中截止1911年，晚清政府签署1100多件），绝大多数具有不平等性质，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侵害。

推翻清王朝后，废约运动最初由孙中山推动，后由中共完成。21世纪的中国，仍在为领土完整、祖国统一而奋斗。

2. 民族平等

中国的民族平等包括在国际社会反对强权和反对霸权。“政治平等”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才取代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占据中国代表权；欧盟拒绝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人权问题；2020年Covid-19的污名等。这都体现了西方在人种、文化、制度上的傲慢。

“经济平等”方面，美西方以“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连续70多年的各种制裁，在国际贸易中对中国采取苛刻和歧视的态度（如GATT、WTO、CPTPP等）。迄今，中国仍在为获得“普通国家”的“平等待遇”而斗争。

3. 珍惜和平

晚清70年，民国38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对外战争，以及国内的民众起义、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战争夺去了无数的生命，战争导致国土丧失，战争使经济发展延缓、停滞、倒退，战争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包括赔款等）使富裕的中国逐渐沦为相对贫穷直至绝对贫穷的国家之一，战争使中国几千年的文物遭摧毁、国宝财富流散海外。

建国70多年，中国的周边安全和发展环境长期相当严峻，1980年至今45年，是1840年以来难得的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目前，是我国的一个战略机遇期。

4. 对外开放的愿望

吸取了长期闭关锁国的教训，建国之初，第一代领导人曾在主观上积极地探索过对外交流、对外开放的强国之路。但是，冷战使中国的国门被强行封锁，香港成为大陆唯一的对外交流的窗口。第二代领导人排除阻力，推动改革开放。

（二）国内环境

1. 国家实力

虚弱的国力基础一开始就成为制约中国外交战略不容回避的现实因素——如中苏结盟。新中国刚建立时一穷二白，国库空虚；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与此同时亚洲人均为44美元；90%人口文盲；人均预期寿命35岁。

建国70余年，前30年巩固，站起来；近40年发展，富起来；未来30年修炼，强起来。国力上升指标包括：

* **科技军事：**“两弹一星”、核潜艇、海基导弹、航母、宇宙飞船、空间站、AI等；
* **和平力量：**港澳顺利和平回归、成功举办奥运&世博&冬奥、大规模撤侨/民等；
* **经济指标：**GDP、外汇储备、债权、贸易总量、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等。如2021年，经济总量17.7万亿美元，占世经比重超18%，对世经增长贡献率达到25%左右。2024年18.94万亿美元，占世界比18%-19%。货物贸易额、外汇储备均居世界首位，服务贸易、对外投资、消费市场规模稳居世界前列；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最为完善、完整的产业链等。

中国国家实力的逐步增长，是决定和影响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物质基础。例如，中国国家实力变化与国际贡献方式变化就对此有所反映，中国的贡献从实物援助（政府行为），逐渐变为金融援助（政府+国民行为）。

当然，也要意识到，中国的国力依然有限。建设“民富国强”的“富强中国”，尚需努力。中国在军力、财力、智力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依然不足。

军事实力方面，陆、空、海、天、网五维军力还较弱；中国的核心技术竞争力、高端制造业较弱；中国外向FDI直接海外投资中优质资产少；中国跨国公司后续力量弱；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弱，精通国际规则、国际法的高端人才队伍数量少和竞争力弱，国际交往技巧“幼稚”、国际传媒弱。

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在国际社会受打压、欺负的境况，中国在国际社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受到限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也受到限制。

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1918巴黎和会，特朗普-泽连斯基会谈都体现了这点。外交被视为一种“软权力”，但支撑这种软权力的是硬实力；通过提高“软权力”的效率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需要将外交变为巧权力（smart power）。

2. 国内政治形势

外交思想（战略、原则、政策）是多重博弈的结果。外部的因素（在国际格局中，国家与它国，国家与国际组织、国际社会等的博弈）涉及军力、财力、智力等；内部的因素则包括国家发展的目标、利益集团、政党、派阀权力斗争等：

* 国家发展战略（近期、中期、长期）；
* 领导人世界观；
* 国内政治形势；
* 决策层意识形态或权力斗争；
* 政治体制构造变动（专业机构与官僚能力）；
* 社会思潮、社会运动、民意动向等等。

上述内容都构成了影响当代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原则、政策）相关因素。

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外交强调安全、领土、意识形态等，单一强调“外交的政治属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建设的中心逐渐向经济转移，逐渐矫正对外交的僵化和片面的理解，全面强调“外交的多重属性”。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济外交”一词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宪法修正案把“保护人权”写入宪章；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第一部《物权法》，巩固了“民本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2009年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

目前，我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是政治外交、经济外交、人文外交。

（三）国际格局

外交既是内政的延续，也是对国际环境的反应。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对诞生于冷战背景的新中国是极为严苛的，严峻的时候多于宽松的时候。中国经历的国际格局有：

* **在1840年至1949年，列强争霸的殖民体系格局：**中国的价值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即原料与市场；
* **二战后，美苏争霸主导下冷战两极格局：**冷战、两大阵营对峙，中国的经济意义被相对压缩，政治意义被相对放大；意识形态因素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外交思想（战略、原则、政策）的重要外部因素；
* **后冷战时期，美国长臂管辖主导下的一霸多极格局：**全球化VS逆全球化，两大趋势均对中国外交思想提出了空前挑战。

总之，这些格局都呈“双向制约”特征：自我束缚-外部强制封锁。

1. 冷战态势

冷战时期，中国面临“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对抗”的残酷现实，尤其在建国初期，外交思想（战略、政策）带有浓厚的为争取生存空间而“斗争”的色彩：防御性、探索性、原则性、灵活性。

中国遭受了政治孤立。1949~1971年的22年中，中国虽然得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和少数西方国家的承认，但在联合国，在国际社会并没有取得公认的合法地位。

中国遭受了经济被封锁和被边缘化。“巴黎统筹委员会”阻断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正常的双边贸易的途径；中国小组1994年才解散。到80年代，中国才取得在WB，IMF等的代表资格。

在安全方面，中国面临着美国主导的双边、多边同盟包围圈，以及苏联的对峙。

2. “后冷战”思维与“韬光养晦与和平发展”的回应

90年代中期，面对“中国崩溃论”（1989），中国采取“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90年代末期，面对“中国威胁论”（1999），中国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首脑外交”“睦邻周边外交”与“伙伴关系外交”。21世纪，面对“中国责任论”“中国贡献论”“新殖民主义”（2008）、“修昔底德陷阱”（2012）、“金德尔伯格陷阱论”（2017）、债务陷阱论（2017）、国家资本主义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崩溃”阴谋论、G2论、“修正主义”、锐实力（2017）等，中国推行国际政治民主化、和谐世界、道义优先的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动分担责任。

“妖魔化中国”的“后冷战思维”依然顽固存在。政治家在竞选时通过打压中国的言论拉选票；反共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性”；西方转嫁国内失策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危机。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主要方式包括歪曲、牵强附会、以偏盖全、无中生有、强势打压等；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封锁，学术战，教育战，以及对中国台湾地区、新疆，香港等等进行挑衅，包括舆论战，与国内外的self-hatred Chinese相呼应。

在战后西方中心的国际格局中，中国长期处于“挨打-挨饿-挨骂”的“弱势地位”“边缘地位”。中国的外交战略在更多的时候呈现出明显的“被动外交”“防御外交”的特征，一些重大的国内发展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也往往是对当时世界格局、地区格局、周边格局变化的某种被动反应，如：

*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中印、中苏、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等；
* 三线建设；
*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快好省；
* 韬光养晦；
* “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革命-建国、革命意识形态等三个历史因素构成了理解、分析和叙述冷战与中国外交缘起这个历史过程的起点、基本线索和基本框架。

新中国外交是在外部冷战与两部的“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的互动中发生和演变的，并逐步建构出一套理念、话语和外交行动方式，以及形成了一些影响相当久远的重要特征。

——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起源（1949-1955）》

五、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 **性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 **总目标：**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1条）。
* **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第七章第54条）。
* **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11条）。

（一）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独立自主指的是国家主权的独立，是指中国人民处理一切对内对外事务的自主权利。

建国初我国奉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政治上，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凡未建交的外国机构如果仍在中国活动皆属违法，对违犯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予以制裁，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特务立即逮捕法办，取消帝国主义强加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军事上，下令收回外国在中国的兵营和租界，禁止西方列强在中国驻军，撤除他们在中国建立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紫石英号”事件终结了列强在华的“炮舰外交”）。经济上，成立海关总署，统制对外贸易；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内河航运权；通过军管、征用、征购、租用、代管、没收、转让等方式全部处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并清除宗教慈善事业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独立自主不是孤立主义。新中国双边外交思想大致上经历了从“同盟（1949-1959）——‘准’结盟（1972-1982）——不结盟（1982-1993）——伙伴关系（1993至今）”的发展轨迹。

独立自主是与不畏强暴、反对霸权密切相关的。中国坚决反对霸权干涉中国事务；对霸权主义，在战略上轻视，在战术上重视；在国际事务中一向对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压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给予极大的关注、同情和支持。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中东问题、科索沃问题、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朝核问题、俄乌危机、阿以冲突等问题上立场鲜明。中国反复向世界表明自己坚决不称霸。

（二）和平发展

和平发展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首要目标。中国近年来的的军费增长属于补偿性增长，是与国民经济发展协调的适度增长。这些增长的军费，主要用于“还旧账”、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武器自主研发、技术发展、完善优抚安置制度体系等。

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军控和裁军，加入了所有重要的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和平条约。中国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身份，积极促进有争议地区的和平解决。中国的军事透明化程度也在提高。

过去70多年，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长，但只是增强防卫能力，不以进攻的“先发制人”为目的。

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十九大报告》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除了执行联合国的PKO行动，中国至今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军事顾问，没有一个军事基地。中国以实际的外交行动，向国际社会证明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靠勤劳增长财富，未输出动荡、输出难民、输出战争。

（三）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基本准则。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愿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中国把和平共处作为外交的基本原则，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保障新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

*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Mutual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and each other's territorial integrity.

* 互不侵犯

Mutual non-aggression.

* 互不干涉内政

Mutual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 平等互利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 和平共处

Peaceful co-existence.

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与友好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四）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建国以来，领导人对外开放的思想、思路不同，但对外开放的愿望是一脉相承的；冷战背景下，中国的国门长期被封锁和遏制，没有条件对外开放；香港成为被封锁年代中外贸、人员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

对外开放主张长期受到来自国内极“左”思想的干扰。开放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如何处理好对外开放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

从范围看，我国的开放从沿海经济特区，到内地经济特区，到边贸特区，再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呈梯级逐步，稳健对外开放。

从领域看，我国的开放从合资企业加工工业，到基础产业，再到商业、金融、信息、咨询、房地产，包括社会保险、教育、医疗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呈纵深发展态势。

从方位看，我国的开放是全方位、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的。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双向开放。1978年至1990年，中国的开放以“引进来”为主；1997年起，我国正式提出了“走出去”。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

（五）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新思维。建国后，在特殊的冷战背景下，国家利益服从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人民利益服从国家利益。1976年唐山地震，中国政府曾拒绝国际援助；1972年中日建交，中国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外交与民众”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观念的转变，外交服务于民的思想逐渐清晰；外交逐渐透明，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以实践外交为民服务的思想。

尽管中国有13亿人口，但我们珍惜每一个同胞的生命。决不能允许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公民的安全。

——《十六大报告》

驻外使领馆人员要全面贯彻“执政为民”的思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侨为本”的宗旨，想方设法向广大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优质服务。中国的外交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同时，服务于地区和世界。

——李肇星

中国预防外交、危机反应和危机管理的能力逐步得到改善加强。2004年11月，成立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级联系会议”，专门应对中国的安全事件，以加快重大危机事件的外交解决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第三讲 当代中国外交体制概述

2025.3.10

一、导论

（一）1949年以前中国外交体制的历史演变

1. 古代外交体制

古代外交体制即传统外交体制（同心圆“外交”体制）。传统的东亚国际体系中所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儒家“德治教化”等政治文化理念为基础，以封敕、朝贡、互市等关系为表征，以礼部、鸿胪寺、理藩院等为主要职能机构的外交体制。

古代外交体制萌芽于先秦，成型于汉唐，宋元明清逐渐巩固，具有相对封闭、与世隔离的封建性质。

长安、洛阳等古都设有“怀远馆”等，免费招待朝觐外使。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访华，出现了“礼仪之争”。1816年，英国再派阿美士德访华，被逐离京。鸦片战争后，列强与清朝的交仍涉被限制在广州，接触的对象是五口通商大臣和两江总督——军机处。1856年以前，英法美的公使不能进驻内地，英国公使在香港，美法公使在澳门。

2. 晚清外交体制

晚清外交体制即洋务外交体制。通过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通过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1861）、首次向海外派遣中国政府使团（1868）、制定出使制度（1875）、任命驻外公使并设立中国驻外使（1876）、领馆（1878）等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中国的外交体制逐渐与西方现代外交体制相对接、相适应。

但是，晚清外交体制并没有立即带来外交的“平等”。各大国只向北京派出公使；清朝也只向各国派出公使；公使驻京的礼节以西方的礼节为标准；话语权的剥夺——外交文书用语、格式等“去中国化”，以英文译本为基准。

1901年《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

3. 民国外交体制

民国外交体制即现代“家国”外交体制。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通过一系列法律文件对国家的外交主体、外交决策机构、外交执行机构等的权能和职能设置作了明确的规定，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中国外交体制。民国实行五院制度（1928年10月实施、外交权相应地在行政、立法、监察、司法、考试五院中分配）。

民国在文本、形式、机构设置上，都已具有了现代国家特征；一批优秀的职业外交官队伍开始形成。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交体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本质，国际地位依然不平等；决策程序、运作机制混乱。

4. 对1949年以前中国外交体制的评价

1949年以前的中国外交体制集中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进程。外交体制的变革（超前性）成为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积极因素。外交体系构建已在理论和实体上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如现代外交体制的基本职能部门（外交部、驻外公使馆、领事馆等）、专业外交官队伍（接受了西方现代外交教育的、有为“国家"效力意识的职业外交官队伍逐渐形成）等。

建国前的外交体制及其实践，从多个侧面为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以后创建新的国家外交体制提供了经验教训。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的外交体制是在全新政治制度背景下的一个全新的体制构建，它的建立与前三个时期的外交体制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或关联。

（二）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外事机构

1.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外事机构历史

1921年至1937年的中共有一定的涉外活动与机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共产党再次取得了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外政策，在抗战初期、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这三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相继设立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机构。

1938年，中共中央长江局于武汉成立了“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人组成。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于重抗战初期庆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周恩来领导。1940年，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布正式建立“外事组”，组长是王炳南。1944年，中央中央军委设立“中央军委延安外事组”，接待联络美军事观察组——“军事外交”的起点。

1945年4月，董必武、陈家康、章汉夫赴美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这是“国际组织外交”的起点，是中共高层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

1947年，在延安设立“中央外事组”，叶剑英、王炳南负责；还开设了外事学校。1948年，中央外事组随迁西柏坡；同年秋，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并组建了外事处，朱仲芷任秘书主任，这是最早建立的一个政府外事机构。1949年1月，中央外事组迁到北平；8月30日，周恩来宣布将以官方身份正式处理对外事务；11月8日，外交部召开成立大会。

2. 关于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外事机构的评价

建国前中共领导的重要外事机构是在战时状态下设置并运作的。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抗战时，对外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解放战争时，对外宣传内战真相，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理解与支持。建国前中共外交宣传的对象起点低：主要争取外国新闻记者、作家、医生、商人和一些青年会、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海外华侨；抗战后期，逐渐与外国官方的军官和外交官有一些间接或直接的接触；董必武在美国7个月，主要争取海外华人和华侨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

在成就上，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外事机构是党际关系、地方外事、人民外交、军事外交、国际组织关系的起源；建立了与外界沟通的渠道；揭露了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培养了一批外事干部。机构上，为建国初期外交工作的顺利展开做好了前期的组织准备；翻译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中央的声明等，是中央编译局的前身；编译教材、各国手册，收集各国报刊信息，是新华社《参考资料》的前身；建立资料室，是外交部资料室和档案馆的前身。

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我国的外交体制基本上沿袭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做法（运作方式），实行党对外交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外事干部的政治素质重于业务素质，依法选拔、管理程度较低。

（三）两个重要理论问题

1. 国体、政体与外交体制

现代民族国家的国体、政体的相似或不同，决定了各国的外交体制既有共通之处，又或多或少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基于国际惯例，各国在外交机构设置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或对等机构。外交部一般都是政府中的第一大部。各国在国体、政体上的差异，使各国外交体制在决策程序、具体权能分配等方面各具特色。

当代中国外交体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依据，以当代中国的国体、政体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世界和平为目的、独立自主的外交体制。

2. 宪法与外交体制的关联

宪法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和外交体制根本的法律依据。各国的宪政经历和经验不同，中国则有短暂的宪政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一共有四部宪法。每一部宪法的颁布及其修订，都对国家的外交体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的外交体制跟随宪法经历了“非常态-常态-非常态-常态”的变化。非常态时期，中国外交依靠领袖魅力维持运作，具有脆弱性、不可持续性。常态时期，中国外交以完善的制度力量维持运作，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是现代国家成熟标志。完善法制、依法治国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已经起步，但尚处于发展、探索的阶段；中国外交体制现代化也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体制

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体制建立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中国共产党党章》。

（一）主要决策机制

我国的主要外交决策机构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1. 中国共产党

《共同纲领》和之后的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明确规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和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合法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外交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导和原则领导。《对外关系法》第二章第九条规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对外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对外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负责对外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第十三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开展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对外关系职权。

历次党代会报告阐述对中国对外关系布局，明确不同国家在布局中的地位

* 建国后，从八大到十一大报告：基本根据两大阵营对立的视角布局中国对外关系，明确反对谁和联合谁；
* 改革开放后，十二大报告：把发展中国家关系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 冷战结束后，十四大报告：把多边外交放在中国对外关系的第一位；
* 十五大报告：把周边国家放在中国对外关系的第一位；
* 十六大报告：首次按照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的顺序阐述中国外交布局；
* 二十大报告：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新舞台。

**党领导国家外交工作的历史**

党在不同时期领导国家外交工作。建国初期建立了中联部（1951）和外交部，1958年之后长期权责不分。“文革”时期：外交部被所谓“文革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夺权”，外交部本身无法正常运转，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陷于极度瘫痪。“文革“后，党政分工，党在国家外交体制中的地位及其职能范围，逐步得到明确化、法制化；中联部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中国共产党同外国政党、政治组织的交往和联络工作。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外交的政治领导和原则领导，在整体上是成功的。根据政治生态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的历史定位、目标和政策的与时俱进的态度，是保持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外交工作能力的前提条件。

**政党外交**

政党外交也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政党被认为是NGO，政党外交与国家外交有严格区别。中国的“政党外交”主要是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之间的交往，它与以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外交、以人大为主体的议会外交、以军队为主体的军事外交以及以民间团体为主体的民间对外交往等形式一样，都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服务于国家对外交往的总体目标和任务。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就与共产国际（1922~1943）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建国初，1951年，成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同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联络工作；1956年，邀请50多个外国政党派代表出席党的“八大”，最多时与89个外国政党建立党际关系；1960年，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中国共产党与东欧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只有11个维持党际关系。“文革”期间，中国共产党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关系都处于“敌对”状态，1976年最低时只与7个外国政党保持党际交往。“文革”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将这四项原则写入了中共党章。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将其扩大到适用于中共处理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提出：“我们将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1997年中共十五大，新党章提出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打开了政党外交的新局面。90年代以来，中国政党外交进入活跃大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为最灵活、最活跃的政党之一。到2016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同世界上166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友好关系。

政党外交有基础作用，是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石：政党外交是国外政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国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渠道，党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学习各党治国经验的便捷途径。政党外交有调节促进作用，是国家关系的助推器：政党外交可增加国家外交的灵活度或回旋余地。政党外交有桥梁作用，是国家关系的开拓者。

**中共领导外交工作的核心机构**

2013年之前，中共领导外交工作的核心机构包括：

*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及其他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组成；是中国外交大政方针决策的最核心的决策机构。
*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1958年设立，“负责全盘外事工作”；在“文革”期间瘫痪，1981年春恢复；2018年改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是中国外交最高决策咨询机构。
* **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2000年9月组建；是国家外交工作中负责危机管理的最高决策咨询机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
* **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2012年下半年成立；协调国家海洋局、外交部、公安部、农业部和军方等17个涉海部门和机构，负责海洋权益；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2018年撤销，并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2013年至2018年，中共领导外交工作的核心机构包括：

*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3年11月14日组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改革；行政、军事、党建综合改革；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3年11月12日组建；统筹国防、外交、国安、公安、外宣办、国新办、商务部、司法部等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关注“大安全”，即主权权益与民生安全；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以确保国家安全。
*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4年2月27日组建；整合公安部、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家保密局、国家安全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军方等涉及网络安全的部门。
* **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3月15日成立；负责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领导指挥体制、力量结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

其他重要机构还有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军委等。

2.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根据《对外关系法》第二章第十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对外关系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加强同各国议会、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全国人大制定外交法、审议和通过涉外法案，批准中国签署的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等；主管外交的政府总理、副总理、外交部长和驻外大使的任命均需通过全国人大同意；全国人大有权按照法律程序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提出质询，还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罢免（包括外交工作人员在内的）政府组成人员；政府必须向全国人大报告包括外交在内的各项工作。

**议会外交**

双边方面，全国人大建立与外国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和友好小组，加强全国人大与各国议会间的互动。1984年，全国人大正式加入“各国议会联盟”；截止2023年，与世界上180多个国家的议会保持不同形式的交往与联系，与136个国家和地区成立双边议会友好小组，接待各国访华议员团逐年增加。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之间定期交流机制基本格局形成；截止2023年，与俄罗斯、美国、印度等21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建立不同层次的定期交流机制和政治对话交流机制。

议会外交打开了正常交流渠道——对话交流；消除误解——阐释中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加深对他国政治体制的了解——重新认识议会外交的重要性。

**全国人大的外事机构**

全国人大最主要的外事执行机构是外事委员会。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设立外事委员会，聚集了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外交英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外交家等。一些非人大代表的专家也成为外委会的顾问。外事委员会主要职责有：

* 参与外事立法
* 审议国务院各部门提请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涉外法案；
* 涉外执法检查；
* 与各国议会的外委会或各种区域性和国际性的议会组织建立联系，展开议会外交；
* 通过声明、信函等方式，对国外政要等对中国的政策等，发出声音，提出批评等；
* 鉴于全国人大没有军事、国防委员会，有关军事往来，由外委会承担；
* 派员长期驻外机构，参加对驻在国国会和国会议员的工作等；
* 国际交流室下设机制交流处、亚非处、欧洲处、美大处。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设的外事局是负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涉外活动的具体工作的机构。

（二）主要外交执行机构及其职能

（三）重要外事辅助机构